



“双一流”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当公务员?

一系列的数字引发了人们对人才培养的思考;这样的职业选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

羊城晚报记者 孙梓青
实习生 谭洁文

名校毕业生更愿意去当公务员了吗?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部分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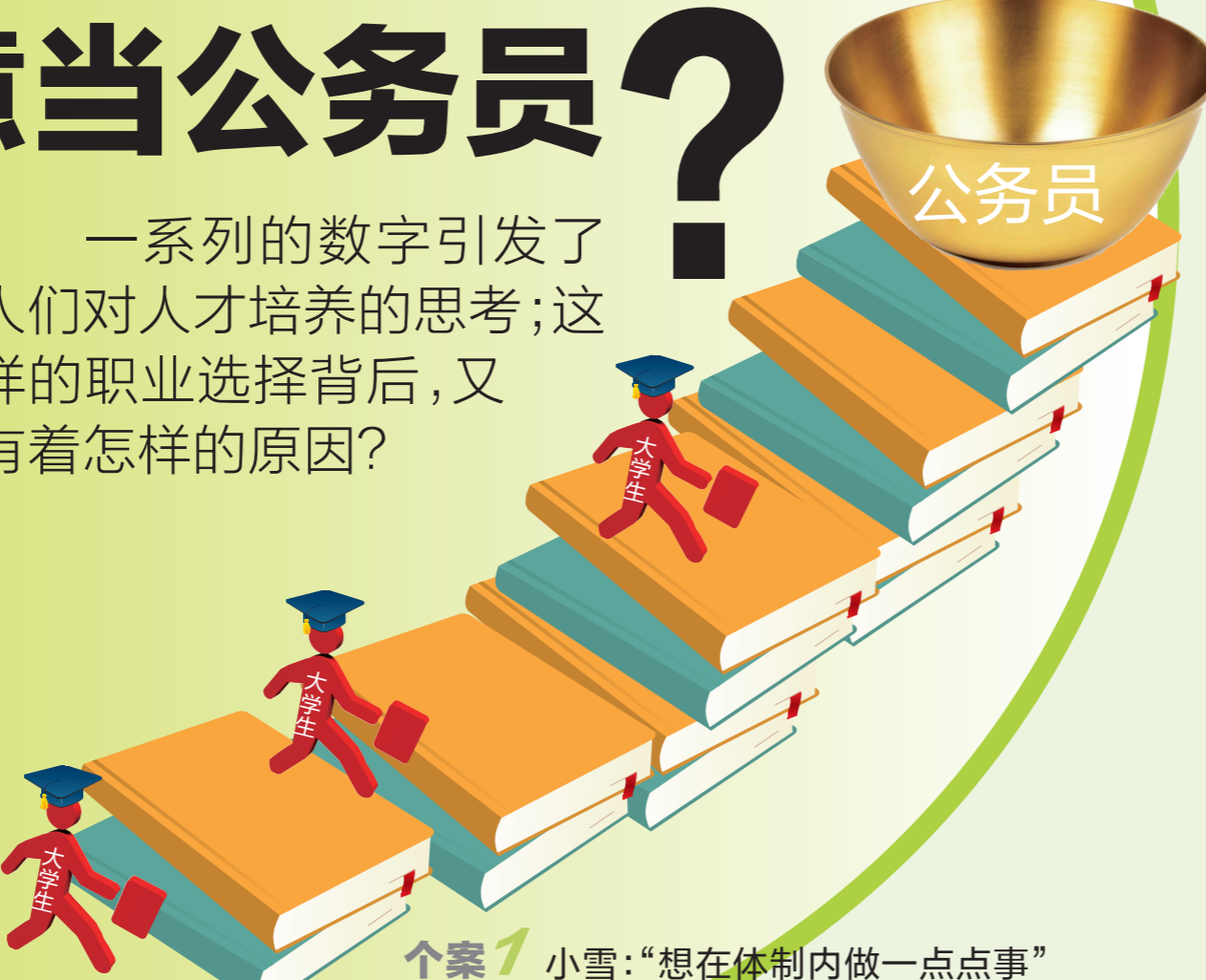
2015年,清华大学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的比例为8.8%,而到202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1.3%。在2018年以前,清华毕业生签约较多的单位几乎全是企业(和少数科研单位)。从2018年开始,福建省委组织部、河北省委组织部、四川省委组织部等名列清华毕业生签约较多单位。

在北京大学,进入党政机关的毕业生比例从2016年的15.68%上升到了2019年的17.05%,其中本科和硕士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的比例都超过了20%。相比之下,进入民企的比例则从17.24%降至11.84%。在北大毕业生重点签约的20个单位中,2019年有8个是各省的省委组织部,在2016年这个数字则为零。

另一个数据是,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1年度考试(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为157.6万,较2020年增加了近14万人,为近三年来的新高。据中国青年报去年底的一份调查,90.9%的受访应届生在找工作更追求稳定,其中31%的受访者青睐国家机关。

相比于数字的变化,这种趋势所带来的讨论似乎更引人关注——去年底,一篇《名校生挺进体制内》的热文席卷各大网络平台,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和对人才培养的思考。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而这又反映出高校毕业生们什么样的职业选择心态,折射出怎样的就业市场形势?且看以下三个个案,或许能带给我们些许启示——



个案1 小雪:“想在体制内做一点点事”

经历了在互联网行业“红海”中的厮杀,即将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小雪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

虽然互联网大厂能够给出可观的薪酬,但在小雪眼中却并非是个“真香”的职业选择。

在以往的实习经历中,某互联网大厂的“大小周”给小雪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果没有完整的两天休息时间,我会恢复不过来。”

小雪告诉记者,自己一直都对公共事务工作比较感兴趣,公务员的工作经历将为她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小

雪觉得做公务员还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

“曾参与过地方政府的报告写作,感觉到我写的东西还真的有用。”小雪说,“像我们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的,这不就是我们的梦想吗?”

犹豫当然是有的。“但我的求职路径是很明确的,虽然我也投了很多互联网大厂,但是去年10月之后,我就全力准备公务员的考试。”在小雪看来,她还是想做一些与专业相关的事情,而公共事务又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然而,即便有名校的“光环”,

小雪的求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小雪向记者表示,在东部某省的选调生考试中,她所报的岗位报考人数高达300余人,最后的录取名额仅有2个,小雪因此与心仪的工作失之交臂。在中央部委层面,小雪面临的则是来自北大、清华、人大等最顶尖名校生的竞争。

“很难说名校毕业生当公务员是一件坏事还是好事。”小雪向记者说道,“有些人不适合当公务员,即便当了公务员,最后也会离开;有些人非常想进体制,通过不断的考试,最终也能如愿。”

个案2 舒舒:“公务员至少是不差的选择”

名校本硕,理工科热门专业。在别人看来,即将从中山大学毕业的舒舒,在求职市场上,站在了就业市场最顶端。

“当时选这个专业,是奔着互联网、金融这些赚钱的行业去的。”在求职之初,舒舒也曾向互联网的头部企业投递简历,但是由于准备不足,折戟沉沙。在经历了求职季的起伏后,舒舒最终选择当一名公务员。

舒舒向记者表示,自己选择走公务员的道路是被动卷入与主动选择的混合。

互联网行业求职的不顺,让舒舒认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没有足够的热情,同样也是将她推离互联网行业的原因:“如果真的要刷题备考,也不是说进不了互联网大厂,但是我对技术不那么喜欢,也没有强烈的意愿。”

另一方面,公务员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医疗保障,都对舒舒产生着不小的

吸引力。舒舒认为,现在学生群体对公务员的看法已经产生改变:“公务员不再给人混饭吃、拼关系的负面印象。只要好好干,在公务员系统中依然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有良好的上升通道。”

从互联网到公务员,舒舒认为,这是自身观念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在职业的选择中,舒舒也曾经反复和犹豫:“但是我觉得,公务员对于我们大部分名校学生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不一定是最好,但一定不会是最差。”

“人是复杂的。”舒舒坦言,“如果说我选择当公务员完全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那肯定不是,但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理想信念。”在舒舒看来,现在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多的优秀大学生当公务员,必然是件好事。”

个案3 文文:“或许是一个‘叛逆’的选择”

同样本硕就读于中山大学某理工科专业的文文,选择了一条与舒舒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很早就认识到,并不想从事本专业方面的工作。”因为偶然的机会,文文开始接触到互联网行业。从最初做新媒体推送、电商运营,再到后来在互联网企业的暑期实习、实习留用,文文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即将入职某互联网大厂在广州的事业部。

文文告诉记者,“自由”是她选择互联网行业的关键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互联网企业的环境和氛围令我向往。”

此外,从小地方考到广州,文文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扎下根”。互联网公司的高工资当然是个原因,“赚钱有什么不好呢?”文文笑着向记者说道。

工作的成就感同样是文文选择互联网企业的动因。“我的工作是为客户提供

解决方案。”文文说,“能够用自己产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通过自己的工作,一点一点推动项目的进展,这样的成就感是很大的!”

阻力当然是存在的。虽然文文自己非常坚定,但是却面临着来自家里的压力。“除去父母,老家的很多亲戚都建议我回老家,考个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好、不太辛苦,再加上老家的资源,都成为家人劝说文文的理由。

“或许去互联网是一个‘叛逆’的选择吧。”文文说。

对于互联网公司996、“35岁危机”等传闻,文文或多或少会有些焦虑。“在互联网企业工作当然会更加辛苦,但会感觉是有价值的。”文文向记者表示。

“的确越来越多的同学会选择当公务员,我实验室很多同学都去考公、考选调。”文文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是我更向往互联网企业而已。”

有培训机构老师建议求职者要清楚两个问题:自己想做做什么?自己能做什么?

在任职于某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曾老师看来,名校毕业生当公务员是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学生自己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对招录人才的学历要求;体制内的工作符合多数学生家长对稳定工作的期望;学生基于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考虑,愿意带着名校的“光环”去当公务员。

“如果说建议,其实就是想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想做做什么,想进入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第二个是想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市场上匹配适合自己的岗位。”曾老师说,“任何一条职业道路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当遇到困难和瓶颈时,要多想想选择这条路的初心。”

(受访者要求,小雪、舒舒、文文为化名)

致敬曹光彪,一位令人感佩的爱国企业家

首席评论

王石川

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收到一份情深意重的礼物。据报道,著名爱国爱港企业家、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曹光彪先生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捐赠清华,助力清华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清华经慎重研究,决定将曹光彪捐赠的这笔资金,用于在清华教育基金会设立“清华大学曹光彪先生纪念基金”,支持清华重大的教育教学改革、科技创新以及延请世界知名学者来校任教等工作。(4月25日澎湃新闻)

曹光彪,生前低调务实,也许不少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一生传奇,在香港实业界举足轻重。比如,他是第一位去欧洲开拓毛纺市场的中国人,被誉为“世界毛纺

大王”;他是改革开放初期首批赴内地投资办厂的港商之一,带动大批港商到内地投资。由于他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99年,编号为4566号小行星就被命名为“曹光彪星”……

曹光彪为人称道,除了实业成就,还与他对内地教育倾尽心血有关。比如,曹先生多次向清华大学捐资。从设立“清华大学曹光彪高科技发展基金”到帮助清华大学建成全国第一套远程教育系统,从捐建曹光彪综合体育馆到设立“清华大学曹光彪讲席教授基金”,曹光彪全身心支持清华发展,令人感佩。正如清华教育基金会曾对曹先生的评价:“只要是清华发展、祖国急需的项目,他都果断决策,并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表现了一位爱国老人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赤诚之爱,体现了作为一位杰出企业家超凡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由此,不能不提曹先生身上最醒目、最直抵人心的标签:爱国。曹先生是香港企业家,无论在港回归前还是在回归后,都对祖国一往情深。如果没有对国家的真挚感情,不可能勇做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内地投资兴业的港商;如果不是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不会花那么大力气,帮助内地高校提升教育质量。

一个生动的例证是,曹先生曾投资收购宁波光学仪器厂,改名宁波永新光股份有限公司。据报道,宁波永新光已经成为全国光学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的光学镜头曾运用于“嫦娥”二号、三号 and 四号等航天工程。“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曹先生在20多年前,就在科技创新上舍得投入,是富有远见的体现,也是爱国的体现,因为他深深知道国家发展、社会进步,

离不开教育和科技。曹先生并非最富有的香港企业家,但一定是最爱国的企业家之一。由此,不能不提财富品质。一个人拥有了大笔财富,如何支配是他的权利,旁人不宜置喙。但是,如果将财富用在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上,显然更能彰显财富的品质,也更有丰富而深刻的时代价值。

从霍英东到曾宪梓,从曹光彪到任淑清……这些香港企业家有个共同点,“有能力就要回报祖国”。2019年9月10日,她与何超琼现身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例会,以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身份,向世界介绍“真实的香港情况”,令人动容。无论曹光彪还是任淑清,他们爱国并不是标榜,更没有功利,越是希望国家越来越好、香港越来越好,“希望为国家做点有用的、力所能及的事”。

被问及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时,曹光彪说:“如果说要说这一辈子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我自己认为,开办香港毛纺厂,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朴实无华的话语,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洋溢其中的是爱国情怀,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担当。

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那些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的企业家,那些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家,那些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的企业家,永远被人们记住,并彪炳史册。曹光彪的人生谢幕了,但他对内地教育和科技的贡献不会消失,他对祖国发展的奉献不会消失,他的爱国精神更不会消失。(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漫画

「光瓶行动」



4月23日,北京市水务局启动“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专项行动,倡议以实际行动培养生活节水好习惯,树立首都文明节水新风尚。行动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会议会展、博物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文化娱乐场所和旅游景区等瓶装饮用水使用重点场所,要带头主动开展光瓶行动。(4月25日北京青年报)

我国是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首都北京则是资源型严重缺水城市,人均可用水量仅150立方米左右,水

“失控的特斯拉”数据与技术壁垒更需正视

热点快评

白须虫

上周如果说最热闹的新闻事件的话,当属特斯拉展车维权事件。几经周折,在千呼万唤之中,特斯拉公布了涉事车辆事故发生前30分钟的部分行车数据,又引起了新一波的声浪。这件足够热闹的事件,只是女车主单方面的事儿吗?只是特斯拉维权核心技术了吗?还是要从更深层次解决更多问题?(4月25日央视客户端)

特斯拉展车维权事件,提取与公布行车数据以及技术检测鉴定,是维权走向实质性的关键。然而,从种种迹象来看,检测鉴定的数据又卡在了公信的瓶颈上,维权本身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似乎都走不出尴尬的困局。

首先,行车数据理论上说,是判断车辆刹车是否失控的直接证据。事件进程中,特斯拉方面在媒体公布的一张事故前约60秒的行车数据表格,其解读一时引发

网友的“倒戈”,因为此“数据”显示涉事车辆超速,且有降速过程。然而,理性来说,正确的结论,还要取决于数据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很显然,单方的片面的数据,使得其作为证据天然就有公信缺陷。事实上,女车主及亲属一直就在澄清其驾驶未超速,然而,又陷于难以举证的困境。很明显,这将是信任的终结。

之所以会如此,还是在数据技术的壁垒。车辆的行车数据记录,与飞机、舰艇之类的“黑匣子”功能类似,技术上是可以随车记录存储,也可以同步上传后台。为何消费者购买了车辆,行车数据消费者本身并不掌握?企业或许可以将其归因于商业秘密,的确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更深层次只怕还是在垄断数据——更利于掩盖技术不成熟的缺陷,更利于拥有消费维权博弈的主动权。正因如此,个案的维权才会显得如此艰难。

其次,如何鉴定争议的属性,独立的第三方“裁判”不可或缺。

特斯拉展车维权事件不但围绕谁来检测的公信难题,随着调查的深入,谁能检测的难题也露出冰山一角。报道显示,特斯拉维权仅有成功的个案,成功源于结构性缺陷,而对于刹车失灵鉴定,三家机构的三次鉴定都未作出结论。不难看出,技术越先进,掌握技术的圈子越狭窄,这不但使得拥有技术的企业,对产品技术有绝对的话语权,同时,也会导致维权技术制约的短缺和掣肘,形成技术方面的壁垒。

特斯拉展车维权事件,女车主所踩的虽然只是一辆车,但发酵了几天之后,她所踩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汽车的品牌,更可能是踩到了智能汽车发展的一个痛点——智能汽车事故鉴定该谁靠谱?涉公共安全如何能倒逼企业尽责?毫无疑问,这些更需要监管跳出个案的视野,在如何更多数据与技术壁垒上,有更多的措施,有更针对性的作为,不能只由消费者单薄的力量来战斗。